

東北師範大學歷史函授專修班教材

隋唐五代史

歷代

東北師範大學函授教育處

1956年1月出版



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二)

隋 唐 五 代 史

李 洵
吳 楓 編 著

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

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第二教研室

1956年1月

隋 唐 五 代 史

編著者：李 洵 吳 楓

出版者：東北師範大學函授教育處

印刷者：吉林省長春新生企業公司

• 本校教材 請勿翻印 •

1956 年 1 月初版 1—1800 冊

例 言

一、本講義適用於東北師範大學歷史函授班學生的學習，並暫作本系二年級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隋唐五代部分的教材。

二、本講義除緒論由李洵同志編寫外，其餘各章皆為吳楓同志編寫。每章均經教研室教材編寫組兩次傳閱一次討論，參加討論的有張亮采、李洵、楊樹森、陳伯岩（未參加第三章至第六章及緒論的討論）等四位同志。傳閱討論後，均經編者作了一定的修改。

三、本講義所附插圖，為張亮采同志所選，由賈乃謙同志搜集，最後又經張亮采同志校閱一過。

四、本講義因教學需要，編寫匆忙，更限於編者理論、業務水平不高，其中的錯誤與缺點，在所難免，尚希同志們給予指正。

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

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第二教研室

一九五六年一月

緒論

一、隋唐五代遼宋金元明清史及其歷史分期

本期歷史包括從公元五八一年至一八四〇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期和解體期的全部歷史，共歷十三個世紀，約有一千二百六十年之久，是中國中世紀史的重要時期，隋、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是統一的封建帝國。其中唐帝國處於中國封建經濟十分繁榮的時期，是一個對亞洲和當時世界有深刻影響的國家，尤其是對亞洲各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響更為巨大。五代以後中國週邊民族建立了不少的國家，漢族建立起的宋、明兩個王朝，與其他民族建立的國家進行了長期的鬥爭。遼、金、元、清都是中國北部諸民族建立的王朝，元、清兩朝更征服中國建立起全國統一的民族統治國家。

本期歷史的特徵是封建制度得到充分的發展，早期封建制殘餘逐漸被排除，古代東方型的國有土地制被強化起來，封建的商品經濟空前地發達起來。公元八世紀四十年代後，中國封建社會有了顯著的發展，均田制崩潰，地主莊園經濟發達，工商業城市及商品生產有着進一步的發展，早期的僱傭關係發達起來，十世紀中葉以後這種趨勢更日益明顯。到了十五世紀中葉以後封建制度發生空前的危機，十六世紀以後在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出現了資本主義關係的萌芽，中國封建社會步入了解體的時期。所以本期歷史不但包括了中國封建制的發展階段，同時也包括了它的解體過程。與基礎的發展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在本期歷史中也有着相應的發展。封建專制主義的集權制度在隋、唐兩代進入新的階段並逐漸加強，宋朝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專制主義的集權制度發達的國家，明代則專制主義集權制度發展到了極峯。適應封建制度的經濟、政治的發展做為這一時期佔有思想界統治地位的「理學」，八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就逐漸形成

了，宋、明兩代「理學」得到充分的發展，並與封建社會宗法觀念結合成為這一時期封建社會的政治觀念與道德標準。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封建社會的進步思想也有所發展，從十三世紀到十七、八世紀出現了不少的偉大思想家如鄧牧、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戴震等人，都提出了初步的民主思想、進化觀點、或反對舊傳統思想的傑出的學說。中國人民在本期歷史中又完成了指南針、印刷術、火藥等具有世界意義的科學發明，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在文學藝術方面也創造了不少的不朽作品，豐富了中國及世界的文化寶庫。更重要的是隨同本期歷史的城市商品經濟發展和市民的形成壯大，小說與戲曲也大大地發展起來，構成中國文學史的時代特徵。

本期歷史的階級鬥爭是熾烈的。隋末農民大起義，唐末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北宋全國農民運動，元末人民反元大起義，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大起義以及清代各族人民的反清起義，都說明本期歷史的農民戰爭的不斷發展與階級矛盾的尖銳性。同時本期歷史上多次的農民戰爭都表現出規模巨大、鬥爭複雜的特點，而且農民的「均產」思想在每次大規模鬥爭中不斷地被反映出來，構成本期農民戰爭的時代特徵。

封建的貴族門閥在這一時期是衰落了，大地主、大官僚階級是這一歷史時期的主要統治者，社會中等階級與市民階級在這一歷史時期活躍起來，統治階級的內部紛爭激化了農民運動的鬥爭也複雜起來了。

本期歷史的民族鬥爭也是熾烈的。這種鬥爭經常發生在週邊民族侵入漢族國家的時期。北宋末年女真族的入侵，南宋末年蒙古族的入侵，明朝末年滿族的入侵，都迫使漢族人民進行了長期的反侵略的民族戰爭。無可否認的幾次民族入侵及其在中國建立的民族統治，都對中國社會發展起了延緩的反動作用。十八世紀左右中國範圍內的各少數民族都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制度的變革，滿清帝國又征服了週邊的各民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多民族的國家開始形成了。

根據以上對本期歷史的特徵的分析，則本期歷史基本上可以劃分三期（或階段），即從隋或其以前

的時期開始到八世紀四十年代爲第一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從八世紀四十年代到十五世紀三十年代爲第二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全盛或成熟的時期；從十五世紀三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爲第三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時期。三期劃分的斷限，因爲八世紀四十年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步入新的發展階段的開始；十五世紀三十年代是中國封建社會解體，資本主義關係萌芽的新時期的開始；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則是中國社會逐漸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開始。每一個分期的歷史本身都具有一定的發展特徵，同時它們之間也反映了本期歷史發展的規律。

二、隋唐五代遼宋金元明清史的史料與史學

中國歷史的史料是異常豐富的，隋唐五代遼宋金元明清史料佔中國歷史史料相當大的部分。雖然這一時期的史料經過歷史上多次的由於戰爭和歷代統治者的銷毀或自然災害的毀滅，湮滅損失了不少，但由於距今較近及印刷術的發達而保存到現在的文獻資料數量仍然是非常龐大的。這些史料大多數是歷代封建政府所修纂或地主階級歷史家的歷史紀錄與著作，其中最原始的部分也多數經過封建官府或地主階級歷史家的纂改，與實際歷史事實大有出入或完全背謬。因此，我們利用這一時期的史料進行探討問題時，必須加以批判和分析，應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對這些史料進行批判地整理，才能够正確地運用史料，做出正確的科學的結論。

由於這一時期史料數量龐大，不可能一一列舉，茲將其中重要的文獻史料介紹如下：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長孫無忌等撰。

舊唐書二百卷，後晉劉昫等撰。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等撰。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宋薛居正等撰。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宋歐陽修撰。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脫脫等撰。

遼史一百十六卷，元脫脫等撰。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脫脫等撰。

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撰。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清柯劭忞撰。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清張廷玉等撰。

清史稿五百三十六卷，趙爾巽等撰。

以上共約二千八百多卷的史料是屬於綜合性的史料。其中除「新唐書」、「新五代史」、「新元史」外，皆係官修，私人撰修的數種後來也被列爲「正史」。「隋書」編纂內容簡鍊，包括有名的「五代史志」，其中天文、食貨、百官、經籍諸志尤爲重要。「舊唐書」於武宗以前多據唐國史原文，以後則採他書或公牘雜傳而成，其價值則在本紀部分之完整詳備及對原始資料之多所保存。「新唐書」的修纂目的在於「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對「舊唐書」力加刪削，尤以本紀部分爲甚，雖增加了不少史實，但多有改寫原文之處，失去原始資料面目，是「新唐書」的嚴重缺點。舊、新唐書因皆具史料價值，故今並存不廢，清沈炳震撰「新舊唐書合鈔」一書，對我們利用兩書史料頗多方便。薛居正「五代史」係據各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而成，史實確切保存原貌。自歐陽修「五代史」修成，薛史湮沒失散，清代修「四庫全書」時才自「永樂大典」中輯出，頗復舊觀。歐史雖較薛史嚴謹，但史實多誤，是其缺點。宋、遼、金三史皆元朝官修，草率從事，自開局修史至告成共三十二個月。但三史皆有國史可據，遼金史更有元初王鶚書爲根據，宋史資料亦多存在，故能在短時期內成書。其中「金史」較爲詳備，「遼史」次之，頗多疎略；「宋史」最爲繁冗。「遼史」的表較爲完備，可補紀傳的缺略。「宋史」雖內容繁冗，但多保存原始材料，可供研究，而且在體例上設「道學傳」，能反映出一定的時代特點。明初詹卒修成的「元史」是根據元十三朝實錄而成，順帝無實錄採他書成之，元代政治經濟制度則多據

「經世大典」，最有史料價值。但「元史」內容譌誤雜出，亟待考正，如速不台等皆一人兩傳，忽必烈以前事迹多缺略錯誤。故改訂「元史」工作歷來爲許多歷史家所重視，而集「元史」修訂工作大成的是柯紹忞的「新元史」，此書用功達四十年之久，考訂「元史」錯誤，並吸取西方歷史家對蒙古史研究的成就而成，較「元史」內容詳盡，考據亦較確切，但本紀部分由於刪削太甚，許多重要史料被刪除，在某些史實的考訂上仍存在不少的錯誤，因之「新元史」雖較「元史」爲佳，但「元史」之史料價值仍甚重要，不容忽視。「明史」的修纂主要根據「明實錄」，天啓、崇禎兩朝則採取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和明末一些私人雜記。「明史」的藍本最初是清初歷史家萬斯同的明史稿本，其次是經過王鴻緒纂改萬斯同原本而成的「明史稿」。清初編纂「明史」的紀、表、志、傳各部分由多人主編，然後纂集而成，就全書比較而言其各部分史實的詳確性，則紀、表不如志，志不如傳，弘治、正德前之傳，不如嘉靖以後各傳。「明史」在歷代官修「正史」中是一部比較成熟的作品，文字簡潔，事實比較詳確。但是滿清在修纂「明史」時，隱蔽和歪曲了大量有關明清之際的歷史問題，希圖通過「明史」來證明滿清侵略的合理性，所以「明史」雖然是一部比較完整謹嚴的明史文獻，但其史實的可靠性是應該加以考訂的，尤其明末歷史更應如此。「清史稿」的編纂主要是依據清國史館的「國史列傳」，和一些有關成書而成，因而內容蕪雜，錯誤百出，而且修纂諸人在滿清已經滅亡之後，猶以「滿清遺老」的身份，百般歌頌清朝的「聖德」，荒謬已極。「清史稿」內容錯誤既多，更乏史料價值，但目前尙無整理清代史料較好的書以前，「清史稿」可作爲研究清史的一般參考，惟必須加以更多的批判和考訂。

本期歷史的編年史料亦甚多，價值亦甚重要。重要的有：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馬光撰。

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宋李燾撰。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清吳任臣撰（亦可做爲國別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宋李心傳撰。

明實錄（自洪武朝至崇禎朝，浙江圖書館傳抄影印本）。

清實錄（自清太祖至光緒朝，附宣統政紀、影印本）。

十朝東華錄五百二十四卷，王先謙撰。

「資治通鑑」起戰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事，其中隋唐五代部分史料價值最高，幾乎都是直接的原始的資料，為研究隋唐五代史極為重要的史料。十國時期史料，「通鑑」過於簡略，吳任臣之「十國春秋」可補其缺，其中蒐集史料豐富，尤其記錄當時人民生活痛苦的史料，價值尤高。「續資治通鑑長編」是一部完整的北宋編年史，史料價值極高，史料來源上自實錄及官府文書下至私人記錄，故極為豐富，是研究北宋一代歷史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南宋歷史資料則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為最重要，史料來源除當時國史外，對野史、家傳、碑誌、文書亦皆採用，故不但豐富，參考價值亦鉅。「明實錄」、「清實錄」皆當代官修，記錄各朝重要的政治活動，社會現象或經濟制度，大多通過記錄奏章諭旨來反映上列史實，一般地都是逐年逐月以至逐日的記載，故較一般史書為詳，同時其中也大量保存着當時統治階級的原始的政治文件，很有參考價值，更由於實錄是當時封建政府內部參考記錄，並不完全公開，故其中也保存不少外面不經見的材料。「明實錄」中洪武、正德兩錄皆經改編，永樂、嘉靖兩錄編纂較為完備。清代另有「滿文實錄」。漢文實錄屢經修改，以乾隆時修改最甚，甚至面目全非。清朝另有「東華錄」的編纂，前有蔣良騐的「東華錄」，據修改前「清實錄」編纂，但只至雍正朝，且過於簡略，王先謙的「十朝東華錄」雖據修改後實錄編成，但內容較為豐富完整，比「清史稿」有參考價值。另外本期歷史都有「紀事本末」的編纂，如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其中記唐代事蹟就有二百三十九條。馮琦、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李有棠的「遼金紀事本末」，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等。其中「通鑑紀事本末」是「紀事本末」體的開創者，而「明史紀事本末」

成於官修明史之前，皆富參考價值。黃鴻壽的「清史紀事本末」內容疏陋，無甚價值。

關於本期歷史的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史料，除各史的食貨志、職官志、刑法志、兵志以外，重要的有下列幾種：

大唐六典三十卷，唐開元時李林甫等撰。

唐會要一百卷，五代會要三十卷，宋王溥撰。

宋會要稿不分卷（宋十種會要的彙輯）。

唐律疏議三十卷，唐長孫無忌等撰。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馬端臨撰。

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不分卷。

通制條格原八十八卷，今存二十二卷。

續通典六百五十卷，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卷，清朝通典一百卷，清朝文獻通考二百六十六卷，皆清

代官修。

明會典一百八十卷，明徐溥等撰。

清會典一百卷，清允禩等撰。

「大唐六典」是一部研究唐代政治經濟制度的最有價值的史料，「新舊唐書」及「唐會要」有關這方面的史料，基本上取材於此。「通典」中有關唐代部分也是研究唐代經濟史的重要的原始材料。「唐律疏議」是研究唐代法制史及社會結構的最基本資料之一。「宋會要」內容雖較蕪雜，但是研究宋代經濟及政治制度，此書史料豐富，價值甚高，如補充李心傳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及李攸的「宋朝事實」，則更為完整。「文獻通考」是一部經過整理的政治經濟史料，其中宋代部分的參考價值尤大，而且

系統性較強，研究各種制度的發展史，此書至爲便利。「元典章」與「通制通格」二書是元代法令、詔書、判決書的史料集錄，其中保存了元代有關政治法令、經濟條例及有關人民生活、階級、民族關係等寶貴的資料。陳垣有「元典章校補」一書爲研究這些資料必要的參考書。「續通典」「續通考」是繼續「通典」「通考」修成的，爲研究宋、遼、金、元、明各朝有關社會政治經濟有用的參考書，其中資料雖多非原始資料，但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清朝於「續通典」「續通考」之後，又修清朝的通典、通考，爲研究清代社會經濟文化比較原始的資料。（此外尚有鄭樵的「通志」及後來續修的「續通志」「清朝通志」，鄭樵「通志」除其中二十略外，無大史料價值，「續通志」「清朝通志」亦價值不大，故此處從略）。「明會典」與「清會典」皆係當時官書，因多保存重要的原始資料，故亦爲研究此期歷史不可少的參考書。

本期歷史中中國週邊少數民族的活動甚爲重要，關於少數民族的史料亦甚豐富。重要的如樊緯的「蠻書」是記錄西南少數民族在唐及唐以前的史料；葉隆禮的「契丹國志」是記錄契丹族主要活動的史料；宇文懋昭的「大金國志」是記載女真族活動的史料；王偁的「西夏事略」是記載黨項族（夏族）活動的史料；明初翻譯的「元朝秘史」是記錄蒙古族早期歷史活動的珍貴史料，爲世界研究蒙古史的學者所重視；關於滿族活動史料如明修「遼東志」、「滿文老檔」，及朝鮮「李朝實錄」等書都是非常重要的。以上各種史料對研究各少數民族社會發展及歷史活動都關重要，而研究民族關係的史料如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一書就是研究宋、金關係非常有用的資料。

本期歷史有關科學發明生產技術的史料，重要的有沈括的「夢溪筆談」、朱彥的「萍州可談」、王楙的「農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啓的「農政全書」、阮元的「疇人傳」等書。在這些史料中保存了我國歷史上偉大發明、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及天文數學上豐富的創造與成就，是研究本期歷史的物質文化史的寶貴的資料。

本期歷史的有關思想文化史料，重要的有劉知幾的「史通」，是中國史學史的重要著作；清張伯行

輯的「正誼堂全書」是研究宋代理學的較爲方便的參考書；「王文成公全書」是研究王守仁及陽明學說的重要資料；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鑑論」等則是研究十七、八世紀社會思想更主要的文獻材料。全祖望的「宋元學案」，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則爲經過整理的系統的研究宋明思想的史料。

本期歷史的對外關係史料，重要的有：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宋趙汝适的「諸蕃志」，元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明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張燮的「東西洋考」，謝清高口述的「海錄」等書。各史中的外國傳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近人張星烺輯有「中西交通史料彙編」，搜集外國方面的記載，甚有參考價值。

本期歷史的地方史資料亦夥，專志一地或記錄地方社會經濟，重要的有宋朱敏求的「長安志」，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吳自牧的「夢粱錄」，清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書。全國性的重要方志有：唐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王存等的「元豐九域志」，元、明、清三朝也都官修過一統志。至於宋、元以來各省、州、縣亦皆編修方志，截至十八世紀中葉爲止的不完全統計全國地方志書不下四千三百餘種，七萬三千四百餘卷之多。這些地方史資料都是有參考價值的，因爲在這些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各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及地區的特徵。

至於一些私人記錄的簡短史料，因有時參考價值甚大，故亦不容忽視。此類史料過多，不能列舉，其史料彙集重要的有下列數種：唐、宋部分爲主的有「歷代小史」，明陶宗儀的「說郛」，鍾人傑的「唐宋叢書」，商濬的「稗海」，清張鈞衡的「適園叢書」，陳蓮塘的「唐人說薈」等書，以明代爲主的有明沈節甫的「紀錄彙編」，清吳彌光的「勝朝遺事」等書。清代部分以「清代筆記叢刊」爲完備。宋李昉的「太平廣記」亦是一個唐代的重要資料集，另有一些類書如：「太平御覽」、「事文類聚」、「山堂考索」、「冊府元龜」、「玉海」等對收集本期史料有巨大的作用。本期歷史的詩文總集如清董誥輯的

「全唐文」，「全唐詩」，呂祖謙的「宋文鑑」，唐圭璋的「全宋詞」，「金文最」，陳述的「遼文匯」，元蘇天爵的「元文類」等，大量地保存了當時極為珍貴的史料，對研究本期歷史有着重要的意義。

本期歷史資料除文獻材料尚有近世發現的敦煌唐代戶籍殘冊，可以考見唐代土地制度情況；北京故宮發現的明、清檔案，保存着極為重要的資料之外，這一時期的歷史文物，至今保存者亦所在多有。唐、宋的古建築，各地尚有存在，南京、北京等地亦保存了大量的明、清歷史文物。其他如貨幣、鈔紙、文書、詔令、繪畫、雕刻、瓷器及手工藝品，也都大量存在。特別是我國在全國進行大規模建設以來，大量的地下資料，如唐、宋、明墓葬陸續被發掘出來，歷史文物的豐富，對於研究本期歷史，有着重大的作用。但是近百年來外國帝國主義強盜在中國盜劫去大批的極有價值的發掘物和藝術品，其中包括敦煌等地出土的文獻及唐、宋名畫、雕刻、文物，最近蔣匪又把掠奪的中國寶貴文物，盜運給美帝國主義，我們歷史工作者與全國人民一樣有責任積極支援解放台灣，追回祖國的歷史文物與寶貴藝術品，這些文物只有回到人民手中，才能使它們在我國歷史研究工作上發揮應有的偉大作用。

關於本期歷史的史學，簡述如下：

唐代封建統治者建立史館，加強了史書官修工作，私人修史受到限制。唐代官立史館除修撰前代史書之外，更注重唐代國史的編撰。偉大歷史學家劉知幾所著「史通」一書，代表了當時進步的史學思想，對後來的封建史觀及歷史編纂學的影響甚大。杜佑「通典」的編纂不但在體例上是創造，同時對唐代史料的編纂上也有重要意義。

宋代是封建歷史學比較發展的時期，尤其是歷史編纂學有長足的進步。對隋唐五代史的編纂整理，除正史外，重要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此書對隋唐五代史料是經過整理而編纂的，成為當時傑出的一部歷史著作。歐陽修對「唐書」、「五史代」的改編工作，亦是本期史學中重要事項，表現出這一時期封建史觀的具體運用。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一書，於傳統的編年、紀傳體之外，又新創「紀事

本末」一體，是宋代史學的新成就，影響頗大。

元代修纂遼、宋、金三史時，關於三史正統所屬的問題，曾引起比較激烈的討論，最後確定三朝各自爲史，但其中「宋史」內容蕪雜，缺點最多，於是改編「宋史」問題成爲當時史學界的迫切要求。當時有周以立、楊維禎等人就曾計劃改修「宋史」，然皆未成。明代嘉靖間柯維騏改纂「宋史新編」二百卷，以遼金史附於「宋史」，藉明正統所在，但內容並未超出「宋史」，只稍爲整理而已。明末王維儉又作「宋史記」二百五十卷，但缺點與「宋史新編」相同。後來更有明王洙的「宋史質」，清陳黃中的「宋史稿」，陸心源的「宋史翼」，清代歷史家邵晉涵亦計劃改修宋史，但皆無多大成就。

十四世紀末年修成之「元史」，蕪亂缺漏不下於「宋史」，後來歷史家計劃改修者甚多，明代倡議改修元史者尙不多，明末大思想家顧炎武首先指出「元史」的嚴重缺點，倡議改修。自十八世紀以迄二十世紀初年有衆多的歷史家從事於「元史」改修工作，一種是重新編纂，重要的有邵遠平的「元史類編」，魏源的「元史新編」，另一種是發掘國內新史料，或整理舊有的史料，提供改修「元史」的可靠資料，重要的如錢大昕的「補元史氏族表」，何秋濤的「聖武親征錄校正」，以及對蒙古史重要資料「元朝秘史」的研究，以李文田的「元秘史注」爲重要。二十世紀初年以後由於有關蒙古史資料或著作大量由外國傳入，使中國研究「元史」的工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些外國史料中重要的有：「拉施特集史」、「馬可波羅遊記」、「多桑蒙古史」等書。因之，對「元史」的考訂工作大盛，重要的有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以「拉施特集史」及西方蒙古史家的著作，訂正了不少「元史」的錯誤，也補充了不少「元史」的缺漏。屠寄集中了中西有關史料，特別着重蒙古初起又西域汗國史實，著成「蒙兀兒史記」一書，總結了前一時期對蒙古史研究的成就。二十世紀初年柯劭忞應用以前「元史」改修工作中的成就，改造舊的「元史」，完成「新元史」的編纂工作。

在十七世紀中葉的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中就出現過進化史觀，「但遭到清朝統治者的壓抑不得發

展，傳統的封建的歷史學仍佔有統治地位。明朝滅亡後，許多歷史家就企圖完成一部「明史」，當時的名歷史家萬斯同就曾作有「明史」，其餘如談遷的「國權」，查繼佐的「罪惟錄」，張岱的「石匱遺書」等，皆是此類作品。更有不少人記錄了明末歷史的片斷事實，現存的尙有一千餘種之多。他們都要以自己的地主階級的觀點立場方法來作出一部滿意的「明史」，或記錄當時的歷史真實情況，來紀念明朝或表現其民族意識，同時更多的人是以此做為歷史的鏡鑑。公元一七三九年滿清政府出版了官修「明史」，這部「明史」雖以萬斯同、王鴻緒等「明史稿」為藍本，但其不少有關於明末抗戰的真實情況，都被刪去甚或歪曲了，對南明諸王亦未給予歷史地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迭興文字獄，禁止一般人私作「明史」，加以考據學盛行，歷史家的工作幾乎全部集中於古代歷史的研究或補作各史志表，明史的研究幾乎停頓。十八世紀中葉歷史家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一書中，一方面吸取了當時進化史觀的積極成分，一方面也對史料範圍及歷史家的觀念作用提出了切實的意見，但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進步的歷史學發展是困難的，加上其本身階級的限制，就使這些方面不能造成更廣泛的影響。辛亥革命後，研究清代歷史成為當時歷史界的主要問題。一九二七年出版的「滿清遺老」趙爾巽等修纂的「清史稿」，基本上是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作品，對清代歷史毫無研究，甚至毫無史料整理或考訂之可言。

二十世紀初年以後，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在中國有所發展。在「食貨半月刊」上發表的一些有關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論文，其中有一大部分是關於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時期的社會經濟問題，其基本觀點是資產階級的，個別的更是買辦資產階級的觀點。與此同時國內歷史界也大量的介紹外國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如日本、歐洲各國、蘇聯的有關中國史的論著，都先後譯為中文。此時有關本期歷史的著作或翻譯，重要的有：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向達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全漢昇的「唐宋帝國與運河」，陳述的「契丹史論稿」，謝國楨的「明季黨社運動考」，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紀」，蕭一山的「清代通史」，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馬可波羅行紀」，陳裕菁譯「蒲壽

庚考」等書。其中論著各書有的是整理排比了史實，或詮釋了史料；有的是研究了一定的問題，提出了一定的結論，作為研究的參考都是有用的，但無論是觀點上或歷史編纂學上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更有一些書如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後來更發展為「清史大綱」，提出了所謂「民族革命史觀」的實辦資產階級觀點，尤為反動。翻譯各書則都作了整理與考訂的工作，作為研究參考是有用的。與此同時，如張蔭麟的宋史研究，金毓黻的編輯「遼海叢書」，陳垣的校補「元典章」與宗教史的研究，以及對明、清檔案的整理等工作，對蒐集整理本期史料與研究本期問題都有重要的意義。

同一時期，日本歷史家研究本期歷史者，重要的有仁井田陞著有「唐令拾遺」、「唐宋法律文書之研究」，對蒐集唐宋法律史料，貢獻甚大。玉井是博對唐代經濟史的研究也有收穫。其他如常盤大定對唐代宗教史的研究，羽田亨、石田幹之助對唐代中西交通的研究，濱口重國對唐代兵制的研究，日野開三郎對五代藩鎮歷史的研究，加藤繁對宋代經濟史的研究，也都有一定的成就。日本歷史家對蒙古史的研究重要的有那珂通世著有「成吉思汗實錄」，小林高四郎對蒙古早期社會史的研究，有高巖對「元史」的研究等，皆獲得成績。研究宋明歷史的日本歷史家有加藤繁、清水泰次諸人，研究滿清歷史的亦有稻葉君山、今西龍等人。日本歷史家研究本期歷史在整理史籍，辨明史實上都有成績，可供我們參考，但這些研究都是用資產階級觀點方法來處理問題，所以我們應當予以嚴格的批判。更有帝國主義的歷史捏造者對中國歷史肆意的歪曲，如日本的帝國主義的御用學者對滿洲、蒙古史的研究，對朝鮮、台灣史的研究，都是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尋找或假造理論根據的政治目的服務，更有不少的帝國主義的所謂歷史家如秋澤修二、早川二郎、佐野袈裟美、森谷克己等人更捏造出中國社會發展的「外因論」、「循環論」、或所謂中國社會的「退化性格」、「停滯性」等等荒謬理論，為帝國主義政治、軍事、經濟侵略作宣傳而已。西方的帝國主義的所謂歷史家、考古家如斯坦因、伯希和等除盜劫中國珍貴的大批文物之外，更捏造出種種謬說，企圖動搖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我們對這些別有用心「的結論」，或故意